

# 国家安危之法

（战国）韩非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条，使国家陷于危急的途径有六条。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祸福依据善恶而定，三是死生依据法度而定，四是判断臣子的贤与不肖，但去掉主观上爱憎的感情，五是区别智与愚，但不理睬众人的百相攻击或称赞，六是设立客观法规而不主观揣度，七是使臣子讲信用而不欺诈。

使国家陷于危急的途径：一是行动触犯法律，二是制裁臣下时偏离法律，三是从别人的祸害中受利，四是对臣民的痛苦幸灾乐祸，五是危害人民的安宁，六是对忠臣不亲、对奸臣不疏。这样的话，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根据，而不再珍惜生命。人民不乐于生存，所以君主受不到尊重；人民不珍惜生命，所以法令不能推行。

使天下的人都能在法度的范围内彻底地发挥智慧、才能和力量，采取行动则能取得胜利，静下心来则能使国家安定。大治之世使人在做正确的事中乐于生存，珍惜生命而不为非作歹，坏人少而好人多。所以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奔驰

的车子仁不会产生像孔丘这样的智者，倾覆的船下不会产生像伯夷这样的廉士。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车船安定时才会产生智者廉士，危乱时就会出现争夺和贪鄙。因此，安定国家的法令，就像饿了要吃，冷了要穿，是用不着强制而自然而然的

古圣先王将治国的法术记载于竹帛之上，由于其道理顺乎自然，所以后世的人都信服。倘若使人去掉饥则食、寒则衣的要求，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了自然规律，即使顺应古道也行不通。如果强迫人们做连勇士都做不到的事，那么君上得不到安宁。君上贪得无厌搜刮已尽，于是臣民回答说：“没有了。”臣民一无所有，于是他们藐视法律。法律是用来治国的，为人所藐视了，所以君主的功业不能建成，英名不能树立。

我听说古时候扁鹊治病，以刀刺骨；圣人要救危扶困，必须接受逆耳的忠言。刺骨，使身体忍受小痛但获得长远的好处；逆耳的忠言，使得心中有点别扭但对国家有久远的福泽。所以病重的人的利益在于忍受疼痛，刚毅的君主从逆耳的忠言获得福分。病人能忍受疼痛，所以扁鹊能发挥他高超的医术；君主能接受逆耳的忠言，所以不会失去像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有病而不忍痛，那么扁鹊的高超医术不起作用了；国家危急而不接受逆耳忠言，那就不是圣人的主意了。这样的话，长远的利益不能泽及后世，功名也不能持久树立。

不以帝尧为榜样自励，而要求臣子像伍子胥，这好似希望殷

朝臣民都像比干，大家都像比干，则君上不会有失误，臣下不会失去社稷。君王不估量自己的势力，而又有像田成这样的弑君臣子，还希望他们都像比干，所以国家得不到一天的安宁。君主不做尧舜，而做桀纣，所以人民不可能乐于献出智能，不会为自己能力不足而忧愁。人民不献出智能，则国家没有功业；人民情愿自己能力不足，则民不畏死。以无功的帝王驾御不畏死的臣民，是达不到号令百姓的目的的。这样的话，君上无法驱使臣下，臣下无法效忠君上。

安危在于辨明是与非，不在于力量的强弱；存亡在于是徒有虚名还是掌握实权，不在于人数的多少。所以，齐国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它的名实不符，君主在国内徒有虚名，名位和实权都已空虚，因此发生了巨子田常篡权的事。夏葵是天子，但他不察是与非，对无功的人进行恩赏，使进谗言的人和阿谀奉承的人以欺诈为可贵；对无辜者进行杀戮，使驼背的人因天生的缺陷而被剖了背。将欺诈和虚伪看作是是正确的，将人的天性不足看作是犯了禁，最后弱小的商汤得以战胜强大的夏桀。

明君巩固国内，所以不会亡于外来势力。身边的事清都没治理好而想不被远处的势力摧毁，是不可能的。所以，周朝夺得殷商的天下，犹如在院子里拾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假使殷商在朝廷里没丢失什么，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秋毫都不敢窥视，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顺应法度，而法度顺应人心。所以法

度所到之处无不大治，如果去掉法度，还会引起人民的思念吗？帝尧在当时并没有与人民定下牢固的盟约，而治国的道术却行得通，帝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子孙，却结下了恩德。所以，能够根据往古的经验而确立治国的道术，并把恩德留给万世子孙的才叫做英明的君主。



韩非(梦勺前 280 - 前 233)，占戈国末期韩国的一个公子，荀况的弟子，后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孤愤》等篇章十余万字，后人编辑成《韩非子》一书

# 兼人者有三术：德、力、富

（战国）荀子

凡兼并另} }国者 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有用道德兼并的 有用强力兼并的，有用财富兼并的。

那个国家的人民以我们的名声为贵，以我们的道德为美，想要做我们国家的人民，因而开门清道来欢迎我们进去。我们仍以那里为人民当作自己的人民使人民仍在原地安居，因而百姓都安居乐业，对我们制定法律、施行命令没有不亲附顺从的。因此，我们得到了土地，权势更大；兼并了别国，兵力更强。这就是用道德兼并别国。

人家并不以我们的名声为贵，也不以我们的道德为美，只是畏惧我们的威势，被我方威势所胁迫，因此，人民即使有离心苗头，也不敢流露出背叛的意图。像这样，兵员愈多，给养费用必定愈大。因此，我们得到了土地，权势反而变小，兼并别国后兵力也更弱。这就是用强力兼并别人。

人家并不以我们的名声为贵，也不以我们的道德为美，只是因为那里人民贫困而求富，饥馁而求饱，便空着肚子张着嘴巴来我们这里求食像这样，就必然要打开粮仓地窖来养活他们，送

与钱财使之富足，安置良吏来接待他们，待满三年之后，这些人民才可以相信。因此，我们得到了土地，但权势更小，兼并别国之后国家越加贫穷。这就是用财富兼并别国。

所以说：用道德兼并别国，可以称王于天下；用强力兼并别国，自己就会削弱；用财富兼并别国，自己会变贫穷。

兼并别国容易做到，而要保持和巩固就难了。以前齐国能兼并宋国，但不能巩固，因而被魏国夺去宋国。燕国能够兼并齐国，但不能巩固，又被齐国田单夺回。韩国的上党地方方圆数百里，城邑完整，库府充盈，归降赵国后，赵国不能巩固，所以被秦国夺去。所以，能兼并别国而不能巩固，所兼并之地必然被人夺去；不能兼并别国又不能巩固其原有的土地和政权，就必然被灭亡。能巩固本国就必然能够兼并别国。得到了土地并且能使之巩固，然后再去兼并别的地方，那就没有哪个强国不能被征服了。



荀子（约前 313 ~ 前 238），名况，时人呼称荀卿。战国后期赵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大师。著有《劝学》等

古时候商汤王所凭借之亳地，周武王所凭借之镐地，都不过是方圆百里之地，但他们后来都统一了天下，以诸侯为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他们能巩固所兼并的土地。所以，年礼巩固士人，用政巩固人民；礼义完善士人就归服，政治稳定人民就安乐；士人归服，政治稳定，这就叫做最大的巩固。用来守卫国土就坚固，用来征伐别国就会强大无敌；令必行，禁必止。这样，王者的事业就大功告成了。

# 君主求英明，臣子求忠诚

（东汉）王符

对君主的称颂，最重要约是英明；对臣子的赞誉，最美好的是忠诚。这两种美德，是从古以来君臣共同追求的。可是明君不常出现，忠臣在万人中难挑一个，并不是他们愚暗无能，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扬名于世，只是因为他们的所用的方法不得当。

英明是依据下边而得来的，忠诚是从上边而成就的。两个人同心，就能截断坚硬的金属。能懂得这个道理的，就会得到英明与忠诚的称誉。关键在于掌握好治国的法术，自己抓住权柄。所谓的术，就是让下边的人不能欺骗，所谓的权，就是让局势不能破乱。法术真的明悉，就是远在万里之外，幽冥偏僻地方的人，也不能不来求取进用。权真的用好，不论远近亲疏，贵贱贤愚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周朝末年就不是这样，背离了法术，放弃了威权，自己懈怠而依赖别人，所以公卿不想尽忠，群臣不想尽力，君主蒙蔽在上，黎民百姓贫苦乱亡在下，由此而逐渐衰微破败无法拯救。

帝王手山的利是很重的，威权是很大的。只使用重利，就足以鼓励人们向善；只使用严威，就足以惩戒奸邪。如果张大重利

而吸引民众，操持重威而驱使百姓，那么世上的人都会拼死沙场而不怨限，赴汤蹈火而不为难，哪里会有想率领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却不能如愿的事情呢？鹰是野鸟，猎人操纵它，还可以使它整日奋击而不敢偷懒，哪里还会有不能让臣子尽心竭力的事情呢？

《诗经》说：“伐树啊伐树，榜样就在眼前。”神明变通的法术，就在君主身上，可是君主却忽视了它，致使群臣噤口结舌而不敢说话。这就是下目被蔽塞，聪明才智无法发挥的原因。统治群下的威权，天天放在君主的眼前，可是君主却放弃了它致使群臣懈怠松弛而背弃朝廷。这就是威信仁德不能普照天下，功业美名不能树立的原因二

《诗经》说：“我虽然与你职责不同，但同为一朝臣子；我好心为你出谋划策，你却不肯听从。”侧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耳中听到啼哭之声，心中都会为之惨恻悲伤，眼睛看到危险之事，都会为之惊惧焦急而前往救助。君臣之间的义很重，过路人之间的礼很轻只是耳目所闻所见，没有恩也没有德，不是贤者也不是贵人，都能同情感伤，急切救助，更何况是北面称巨，受君主宠信的人呢？

所以尽忠诚而扶危难，是贤者与无德无能之人的共同心愿。心中确实愿意而行为又与此相违反的原因，主要在于常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不利反而有害，言论不被信用反而造成身败名裂。看看从古以来倾心君王、忧虑主上、敢言直谏的臣子，忠直信诚不能上达，却被左右之人罗织陷害，受尽打击，最后变成愚

蠢恶劣臣子的，难道能数得过来吗？孝成皇帝一直到死，也不知道王章的正直；孝哀皇帝一直到死，也不知道王嘉的忠诚。这就是后来的贤人虽然有忧君哀主的情怀，忠诚正直的节操，去[沉默不语，根据世道风情来行事的原因。

鹤在幽暗的地方鸣叫，其子也要应和。看看那鸟类，还在寻大同竿的声音所以君主不展示出精诚心志给贤者忠臣看，贤者忠臣也就无法向上表达其心志。《易经》说：“君主英明大家都有福气”所以忠臣一定要等待明君才能显示其志节，良吏一定要得到明察的君主才能建立功勋。君主不英明，就会使大臣隐蔽下情而阻遏忠良，使政府各部门舍弃法纪而阿谀权贵。

忠言本来是为了安定国家，可是不贡献出来必然使国家危险；法令禁条本来是为了治理国家，可是不遵奉必然使国家败乱。忠言能入能贡献，法令能不能遵守，关键都在于君主，这不是臣下所能左右的。所以圣明的君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责备臣下。

凡是君主做到法术严明而信赏必罚的，虽然不说话，治理的局势自然就会形成。治理的大势一成，君主想把它搞乱也不可能，何况是臣子呢？法术不严明而赏罚无准的，虽然整天发布号令，败乱的局势也会自然形成。败乱的形势一旦形成，君主想要治理也不可能，何况是臣子呢？所以治势形成，虽然松懈一点也不会败乱，乱势形成，虽然精勤也无益于治。尧、舜自身恭谨，无力而治也有余裕，是因为治势已成。胡亥、王莽瘦于奔命也无

法治理天下，是因为乱势已成所以说：明白人在势上下功夫，而不去要求人英明君主审核法度而公布教令，不放任私欲来屈任公法，不违犯教化来干扰政令，因而臣子敬重其言语而遵奉其禁令，竭其心力来称任其职，由此而导致法术明行而威权自重。

所谓的术是这样的：精细、深奥而神明变化，说起来无法尽意，行起来却饶有余裕。有余裕才能普被四海而光照幽隐。权作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势，只有强健有力才能张大它，不论贵贱之人，只要操持住‘已’，本身就会威重。威重就可以侵夺君主的威严而号令天下。所以英明的君主从不把术明示于人，也从不把威权移借到下边。孔子说：“不可授人以权。”所以圣人显明仁德，隐蔽手段，神明变化，使百姓各得其所。然后才能治理好天下而成就功业。功业给百姓带来好处，美名传播于天下，这样君主才能称得上英明，臣子才能称得上忠诚。这就是所说的英明是从下边得来的，忠诚是从上边成就的，两个人同心，就能截断坚硬的金属。

君主有美好的称誉，巨子有美好的名声，君臣同心合力，就会使意愿实现。珍视自己的威权，神化自己的法术，情感不向下边流露。只要形成治理的局势，就不再容易动摇。



《管子·法法》卷

《管子·法法》卷

《管子·法法》卷

《管子·法法》卷

# 欲成功必先接近君主

（战国）韩非

拥有国家的诸侯，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然而君主被蒙蔽，大臣们独断专权。齐国灭亡，不是因为土地和城邑丧失了，而是因为吕氏不能控制国家而被田氏所取代；晋国灭亡，也不是因为土地与城邑丧失了，而是因为姬氏不能掌握政权而被六卿所取代。现代大臣们独掌大权独白行事，而君主却不知道收回权力，这就是君主不英明。与死人有相同病症的人，是不能活下去的；与亡国有一样的情况国家，是不能存在约。今天沿袭齐、晋想保存国家的老路，这是不可能的。

凡是推行法治的人，他的主张都很难实行，不仅在有万乘兵马的大国，在只有千乘兵马的小国也是一样。君主的身边，不一定要有有才智的人，君主认为某人有才智才听取他的意见，并且与身边的近卫来讨论他的言论，那就是与愚人去讨论有才智的人。君主的身边不一定都是有道德的人，君主认为某人有道德而以礼对待他，并且与身边的近卫讨论有道德的人，这就是与缺乏道德的人去讨论有德行的人。有才能的人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判断，有德行的人靠缺乏德行的人来评判。那么有德行的人和有才

能的人 would 感到羞耻，而君主得出的论断也必定是荒谬的。臣子中想要得到爵位的人，是在德行修养上严格要大于自己的人，将会专自于国家的事业，使自身保持廉洁有才智的人，将会以办理好国家政事来奉献功业，在德行修养上严格要求自己。有才智的人是不会以财物去贿赂别人的，而是依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办事，更不会违犯法令去治理国家，因此有德行、才智的人是不会去讨好君主身边的人，也不会去理会私人的请求拜托。

君主身边的人，不像伯夷那样廉洁，他们要求索取而得不到，财物贿赂但没有跟上。即使是有德行、有才智的人，他们廉洁、善辩的功业也要被淹没，而诽谤诬陷的言论就会多起来了。治理乱世的功业被君主的亲信所制约，廉洁的行为被诽谤所裁决，那么有修养有才智的官吏就会被废除，而君主的明见也就被阻塞了。不按照功劳业绩来裁决智慧和德行，不以反复验证来审查罪过，而是听信身边亲信的话，那么没有了能的人就会充斥朝廷，而愚蠢腐败的人也能当官了。

有万乘兵马的大国所害怕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有千乘兵马的小国所害怕的祸患，在于君主对身边的人太宠信。这是所有君主共同的祸患。况且臣子有大的罪行，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与君主的利益是相对立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当官，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也能得到职务；君主的利益在于建立功业就赏赐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能得到富贵；君

主的利益在于重用有才能的豪杰，臣子的利益在于勾结党羽、图谋私利因此，国家的土地少了，而私人的土地就扩大了；君主的权势卑微，而大臣的权势扩大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臣子得到犷国家，君主改变地位而成为善臣，而大臣、相国却用虎符发号施令。这就是臣子欺诈君主，以便图谋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世的重臣在君主换代以后，仍然受宠的，也就只有十之二三。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臣子的罪过太大了臣子最大的罪过，就是欺骗君主，这罪过应当处以死刑。有智慧的人富有远见而又畏惧死亡，必然不会追随重臣的；贤能之士美好、廉洁，因而耻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主，必然不会追随重臣的。因此追随当道掌权的人不是愚蠢而不知道后患的，就必然是腐败且\_\_不回避奸邪的人。重臣带领着愚蠢腐败的人，对上欺诈君主，对下搜刮钱财，侵害掠夺，结党营私，众口一词，迷惑君主，败坏法纪，在官员和百姓中造成混乱，损害国家利益，使君主名声受辱而烦恼，这是最大的罪行。臣子犯如此大罪，而君主却不加以禁止，这是最大的过失。假使一个国家上有君主犯如此大的过失，下有重臣犯如此大罪，想要这个国家不灭亡，那是不可能的。

通晓治国方法的人，一定要有远见和明察，没有明察就不能知道隐蔽的事情；能推行法治的人，一定要坚强果断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正犯罪的行为。臣子要依照君令来办事，依照法律来履行做官的职责，这不是所说的权重的人。权重的人，不会依据法令而是自作主张行事，破坏国家的法制来谋取个人的

私利，损耗国家的利益来方便自家利益，他们的势力可以控制君主，这才是所说的权重的人。通晓治国方法的人会明察，他们的见解会被君主采纳，还会被君主任用，而且会洞察权重人的隐蔽事情；推行法治的人刚劲正直，他们的言论会被君主采纳，还会被君主任用，还能纠正权重的人的犯罪行为。因此这两种人得到任用，权重的大臣一定不会维护法律。通晓治国方法的人，推行法治的人就会与当权的人势不两立

当权的人独揽国家大事，那么国内外的诸侯、官员都被他利用了。因此诸侯们如果不依附他，那么办事就会办不成，所以势力相当的诸侯都会称颂他；国内的官员如果不顺从他那么他们的功业就不能进献到君王那里，所以臣子们都会替他干事；君主身边的郎中如果不顺从他，那就不能让他们接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都帮他隐瞒实情；学士如果不顺从他，那就收入微薄、礼遇低下，所以学士们都吹捧他。这四种帮助“重人”的人，都是奸臣用来掩饰自己不轨行为的工具。权重的人不会对君主尽忠，反而会进荐君主的仇敌给君主，君主不能越过这四种帮助权重的人的人去洞察他的臣子们。所以君主越被蒙蔽，那么大臣的权力也就越大

当权的人很少有不被主人信任、宠爱的，并且与君主很熟悉，讨好君主的心意，投合君主的好恶，就使自己更能被君主信任。他们高官厚禄，同党又多，全国的人都在歌颂他们。那么，那些推行法治的人想征求君主，不但没有真心的喜欢、亲昵的恩

惠，而且又要用法制的言论去纠正君主的邪恶念头，这都是与君主的心意相反的。推行法治的人则处于卑微低贱的地位，没有党派的支持，孤立无援。

如果要君主疏远的人与被君主宠信的人相争，按理他是不能取胜的；如果要新来的过客与亲近的熟人相争，按理是不能取胜的；如果要违背君主意愿的人与投合君主意愿的人相争，按理是不能取胜的；如果要地位低下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相争，按理是不能取胜的；如果要推行法治的人的一张嘴与操纵国家大权的人相争，按理是不能取胜的。推行法治的人处于上述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中，又因为长年不能得到君主的接见，当权者凭借了以上五种有利的条件而且无论何时都有机会向君主进说。所以推行法治的人怎么会得到重用，而君主何时才能醒悟呢？因此在上述条件下，推行法治的人都不可能取胜，而且推行法治的人与权重的人是相对立的，推行法治的人怎么会没有危险呢？

那些权重的人可以用罪名去诬陷他们，这样就能用国家的法治来杀死他们。对那些不能强加罪名的人，就会私下派刺客去刺杀他们。这样，推行法治却违背君主意愿的人，即使不死于官吏的杀害，也一定会死在刺客的剑下。那些结成党羽相互勾结去蒙蔽君主、歪曲事实来使个人得利的人，就一定会被权重的人重用。因此他们可以用功劳作为借口来得到爵位，享受荣华富贵；不能用好名声作为借口的，就以诸侯的颂扬使他们身价抬高。因此蒙蔽君主而依附于私门的人，不是在官爵方面显赫起来，就必

然被诸侯重用。

现在，君主不进行实际考察就施行死刑，不等见到功劳就授予爵位和厚禄，那么，推行法治的人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来进献他们的言论呢？奸邪的臣子又怎肯在得利的时候自动引退呢？所以，君主的声望就会越来越低，私门的地位就越发尊贵。

# 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

（战国）荀子

至于日复一日详尽地处理事务，权衡事物性质以便恰当使用，使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所穿的衣服有一定规格，各类宫室有一定的标准，仆从人数有明确规定，丧礼、祭祀所用器具均符合等级规定，把这样的治理方法普遍施用于万事万物，尺、寸、寻、丈等具体事情，没有不遵循制度数量的规定然后才实行的，这就是各级官吏的事了，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作为君主，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正确，所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真正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自己安逸而国家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正确，所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自己劳累而国事紊乱，功业废弛而声名狼藉，国家必然危险。这是作为君主的关键所在。

所以，任用一人得当，就能取得天下；任用一人失当，国家就要危险。任用一人不当却说能恰当任用千人、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能任用一人得当，那么还有什么劳苦之事需要亲自去做呢？只要披着衣裳，闲坐朝廷，天下就安定了。所以，汤王用了